

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最初短时间内基本奉行全国一致的革命路线。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后，依照中央新的指示，在东北贯彻执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过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前后十四年，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写下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历史篇章。但是，这一段历史，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加以系统的总结，有待于各方面的及早努力。本文仅仅用单纯的回忆形式，并偏重于军事方面作概括的叙述，为了解、研究东北人民革命历史提供参考素材。

一、东北一般状况

旧时代人们常说：“关东山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世界闻名的原始森林参天高。东北地区虽然处于严寒地带，因为冰雪覆盖着广阔的原野，滋润了肥沃的土壤，风调雨顺，水利丰富，实为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好乡土。能供应现

代化需要的地下矿藏，种类几乎应有尽有，数目非常之多，真是一块半开发或未开发的处女地。就这样，“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日本军阀首相田中义一奏折称：“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把侵略东北当成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首先必须夺取的扩张基地。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反动派通过诱使张学良“易帜”，加强了他们在东北地区（包括原热河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相对稳定，促使美、英、法极力拉拢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拉拢奉系军阀张学良。这样就加剧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一方，以美、英、法帝国主义为另一方，为争夺中国和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尖锐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以旅大及附属地为立脚点，在东北有近三十年的经营，尤其在南满更握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控制权，当然不能容忍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推进和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家越来越巩固。以美、英、法为背景的，由蒋、张发动的反苏进攻又遭挫败。中国土地革命在长江流域正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差不多都错综复杂地集中到东北，或直接、间接地影响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进攻苏联，特别是它认为要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同时为扑灭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尽其宪兵

作用，反对它的竞争者美、英、法帝国主义，那就非发动武装侵略，占领东北不可。日本帝国主义也估计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蒋介石是会“逆来顺受”，宁肯对外不抵抗，对内也毫不放松对人民革命的镇压；而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也会袖手旁观，放任日寇为所欲为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走钢丝”当作坦途，向东北进行武装进攻。

二、事变的突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炸毁了沈阳北柳条湖火车道，然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制造了所谓“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开炮袭击奉军北大营和兵工厂，占领了沈阳市。当时南京政府蒋介石总司令命令东北的张学良副司令采取不抵抗的方针，一味“退让”，助长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于是日寇很快占领了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翌年一月进占哈尔滨，^①大体上控制了满洲战略地区。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建立伪满洲国，抬出傀儡溥仪做“执政”。从此东北沦陷，东北人民蒙受了做牛马奴隶的奇灾大难。当时民间曾传诵着这样的一首歌谣：

日寇袭来莫慌忙，
攘内安外蒋主张。

^① 日寇攻下哈尔滨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周保中同志此处是指进攻哈尔滨的时间。

御敌有术不抵抗，
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命，
叫尔小民做羔羊。
亡国恨，空前绝后！
要生存，惟有自强！

三、党的主张

在中国大革命以及土地革命时期，东北虽然没有象长江流域那样掀起过大的风暴，但东北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影响下与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曾经在南满和北满一些地方发生过规模较小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阶级的革命运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与奉系军阀合流以后，这一斗争日趋尖锐。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指使，向苏联进行试探进攻。中国共产党特别指出：东北的外来危险，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阴谋；东北人民和土地有被蒋介石反动派出卖的可能性。不幸而言中，“九一八”事变，证明了这个预断，同时也表明了东北人民对日寇侵略东北，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不是没有革命行动的。

事变后两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宣言。九月二十一日满洲省委发出紧急通告，强调指出：日寇侵略东北其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并为进攻苏联做准备；中国人民，东北人

民的民族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卖国投降政策给带来的，不能对它寄予任何幻想；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自己起来救国自救，组织民众政府，自动抵抗日寇进攻，才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一号召，深入东北民心，因而掀起了东北初期抗日救国高潮，武装军队纷纷起来抵抗日寇，给日寇军以最初的打击，迫使日寇不得不推迟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计划。

四、初期抗日，旧军队的崩溃

事变爆发后，东北广大军民，对南京政府的“镇静”、“不抵抗”感到非常失望，因而激起了义愤。在日寇还未占领的北满、吉东地区，掀起了自动抵抗的浪潮。黑龙江地区马占山所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①揭起抗日旗帜，部队开往嫩江桥前线，英勇地阻击进攻的寇军。继之而起的有：苏炳文的东北屯垦部队（黑龙江省抗日军）；中东铁路护路军丁超军两个旅^②；镇守依兰的李杜二十二旅^③；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④；守备吉林市的冯占海、李海青^⑤等的警卫队

① 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正式爆发是在十一月三日，但在十月间北部边防军黑龙江军已经同投降日寇的张海鹏部逆军交战，周保中同志说十月揭起抗日旗帜亦可。

② 此处应为中东路护路军丁超的二十八旅和赵毅的二十二旅。

③ 李杜所部应是二十四旅，此处作者记忆有误。

④ 此处应为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六六〇团。

⑤ 李海青，原名李青山，又名李忠义。他原是黑龙江万福麟部下营长，事变前因事系狱，为马占山放出抗日，他并未充任吉林军里的警卫队，周保中同志此处记忆有误。

（吉林自卫军）；辽宁旧东边道地区的奉军唐聚五、李春润部队（辽宁民众自卫军）等都宣布“抗日救国”。驻在延边的原吉林陆军第三旅第七团的“老三营”^①，以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为首，在事变后不几天就暴动起来了，刹那间卷入数万之众，组织救国军到处打击日寇。辽东三角地带带有邓铁梅、苗克秀、王凤阁等部；辽西和辽热边境有耿继周等部义勇军。此外各地保安队、警察武装也纷纷起来抗日。有些地区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起来积极抗日。就是那些由畸形社会条件造成的“胡匪”队伍也都打起“反日山林队”旗号，阻挠日寇的行动。从事变后到一九三二年初，北满、吉东、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达三十万人，辽东南和辽西近十万人。其中五分之三是旧东北的正规军，人员配备很完整，有相当的战斗素养。军事后备潜力是很大的，仅民间枪械就近百万支。作战可以依据和回旋的地区也是很广的。这四十万左右的军队受到全东北人民沸腾的抗日情绪所鼓舞，斗志是高昂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地区组织当时的力量虽然还微弱，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但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共青团员，曾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各地给这些抗日武装军队以各种支援。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抗日援马代表团”的名义，到黑龙江战地进行慰问和宣传鼓动，并派志愿兵参加战斗。翌年一月，

^① 王德林的“老三营”原属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此番号之前为吉林陆军第十三旅第七团，六七六团是后改成的全国统一番号。周保中同志沿用的是旧番号，但又把十三旅误为三旅。

曾在哈尔滨宣传和组织各阶层群众支援吉林自卫军在双城、榆树地区的作战，组织各界群众协助自卫军保卫哈尔滨的活动。当救国军在延吉暴动前夜，中共东满特委派遣有力干部多人，参与暴动和组织救国军的计划。在救国军进攻敦化、额穆、东京城、宁安、汪清地区行动中，党的干部同该军的上层领导左倾激进分子互相配合，树立了坚强作战指挥，并动员东满革命群众组织义勇军参加作战，或担任交通运输，以及敌后的别动游击。中共南满特委和吉奉铁路线的党组织以同样的积极行动，对辽宁民众自卫军——辽东、辽西反日义勇军给予支援。各级党的活动干部，曾向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恳切地提出过建议：抗日军队必须依靠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必须团结一致，分区活动，统一指挥，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并采取机动作战，放弃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党曾经耐心地开导和不倦地宣传解释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首先是发挥朝鲜民族的抗日积极性，使他们广泛地参加抗日斗争。但是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们，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往往拒绝党的主张，有的人口头上接受，暗地里还是坚持自己那一套，或者接受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拒绝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在某些领导上层人物中，虽然没有执行公开的“反共”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自动组织武装抗日是违法的，因此最初时期，党所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海伦游击队、汤原游击队被黑龙江抗日军摧毁了。穆稜和密山游击队被吉林自卫军缴械了。磐石和海龙游击队两次受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延边各县的游击队受到救国军的限制。有的救国军领袖还不止一次的阴谋暗杀

党在该军中的领导干部和左倾激进分子。

这些旧军队上层领导们，虽然揭橛着抗日救国的旗帜，军队上级军官、战士和人民群众还跟着他们走，但他们并未脱离旧军阀的老路。他们之间经常为了抢夺地盘扩充个人势力、争夺关内外爱国捐款、分配驻地、军事物资等而进行内部斗争，甚至互相火并。在军事上，每与寇军接触，士兵在前方奋战，有的将领就在后方逃亡。各军之间没有相互支援，甚至有些将领“身在曹营心在汉”，早与日寇特务勾勾搭搭，或者促使抗战行动垮台，或者一遇局势稍稍不利就动摇投降日寇。

当着黑龙江抗日军正在嫩江桥声势浩大地抗击日寇的时候，海拉尔屯垦区苏炳文等以及吉林省丁超、李杜等的自卫军静静地作“壁上观”。等到日寇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丁、李、苏等才不得不起来抵抗。而声震一时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却与日寇谋妥协。日寇正准备从牡丹江西岸向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进攻的时候，救国军孔宪荣，谋杀了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①，给日寇造成了进攻的有利条件。

总之，初期抗战的最大弱点是：第一，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影响，在这些抗日旧军队中的上层领导人物的头脑中，占着一定地位；第二，广大群众和爱国战士，还没有能够从反动统治传统思想下解放出来，束缚了高昂的斗志；第三，共产党在东北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人民游击队的力

^① 马宪章，字则周，时为左路总指挥。杀害马宪章者为刘万奎，外号刘快腿，此人后来投日。当时风传刘万奎杀马系孔宪荣唆使，但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确实证据。

量还小，还不能在这些旧军队里起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关东军最初仅仅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事变，并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以后寇军增加到四个师团向北满和吉东、东满举行进攻。日寇充分地利用了抗日旧军队上层领导的腐败和弱点，施展政治分化、特务渗透、挑拨离间和收买诱降等手段，配合着正面的军事行动。这些庞大数量的抗日军队，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被各个击破，并使之趋于瓦解和崩溃。日寇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整个局势。虽然在嫩江地区，吉林、长春地区，奉吉铁路沿线，牡丹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曾对日寇军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抵抗，牺牲了不少的英雄人物（日寇死伤亦达二万余人），但是由于丁超、王之佑等投降，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的逃跑，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宣告挫败，影响所及，使东北广大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浪潮趋于低落。

五、抗日游击战争新高潮

以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斗争过程中，虽然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受到少数上层领导的反对、阻挠、破坏，但是东北党组织坚持不渝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路线，组织人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以坚决彻底地进行抗日自救、收复失地为使命。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党组织在南满、东满、北满各地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爱国人士中不倦地宣传鼓动，组织群众性的、公开的、秘密的“反日

会”和“农民义勇军”。延边、磐石、海龙、宁安、穆稜、密山、饶河、汤原等县组织了人民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限制，几经被破坏，但仍然主动地、勇敢地参加旧军队的抗日作战，在斗争中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到达满洲省委，这正是旧军队崩溃瓦解之后，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而日寇额手称庆，进犯热河，巩固长城线，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缔结“塘沽协定”的时候。满洲省委号召与督促全东北党组织，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加强扩大各地人民游击队；另一方面在溃散后的各色反日武装部队中积极开展工作，以挽回东北抗日消沉和混乱的局势。在三万左右武装救国军中，加强党的领导，重新建立救国军总司令部，整编各路军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在救国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第二次攻占安图县城，控制了全县和邻近的抚松、桦甸、敦化、蛟河各县的一些小城镇和地区，建立起“辽吉边区”根据地，不断袭击京图铁路沿线的交通运输和寇军据点。在宁安县境，新编的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干部，组织了党委。他们团结了救国军、自卫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约二万人左右。在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攻占了东京城、南湖头，袭击了宁安县城，展开了牡丹江流域的对敌游击战，不断打击出扰的日寇，威胁中东铁路东线地区。东满延边各县的人民游击队，揭穿了日寇进行民族挑拨的阴谋，变民族歧视、对立，为民族团结合作。他们与救国军和各种反日山林队相互支持，西至“辽

吉边区”，东达中东铁路。这里的朝鲜人民游击队，团结好，纪律好，战斗力强，成为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力量。南满方面自一九三三年夏，海龙和磐石游击队合并改编为磐石人民游击队，同年秋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在这过程中，由于该部队的积极活动，联合与支持着吉奉铁路沿线最大的反日山林队“殿臣”、“双江”（罗明星）、“老双胜”、“德林”等约万人的抗日武装，不断破坏铁路交通，伏击日寇。吉奉铁路交通曾被切断半年之久，吉林市和抚顺矿区经常受到威胁。磐石人民革命军分遣部队扩大活动到达通化及安奉铁路线，联合着那个地区的王凤阁部队，以及辽宁自卫军的残余部队——邓铁梅、苗克秀残部约七八千人，坚持抗日游击斗争。

由满洲省委直接指导的珠河县中心县委，一九三三年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在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右岸、中东路两侧，展开游击斗争，不断获得胜利，吸引着自卫军的残余部队李华堂、于海云、孝凤林及其他反日山林队，共约一万多人的武装。从珠河游击队——哈东支队为中坚，继续同日寇对抗。远在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饶河游击队，支持着救国自卫军陈东山、高玉山等四、五千人的抗日部队联合行动，曾经攻占虎林县城及团山子等地，不断打击乌苏里江岸的寇军。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南北满由旧军队留下来的，以新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抗日武装总计十余万人左右。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不再起领导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它的威望提高了，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行动主张，大体上为他们所接受；（二）党所领导的人民武

装——游击队逐渐扩大加强了，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比较系统的、高级的组织形式，并成为各种抗联武装的榜样和核心力量；（三）南北满各地的抗日武装开展规模不同、作战方法不同的游击战斗，使日寇军到处遭受打击，兵力损折越来越多，迫使日寇改变以往的作战方式——由以静制动，以少胜多，分进合击，各个击破，不得不增加兵力，分散到广大地区，处处防守，陷入被动，随时随地有遭受袭击的危险；（四）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以后，不仅在游击地区的人民群众几乎普遍地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直接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就在寇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沿线据点，也都建立起地下“抗日救国会”和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短时间挫折之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日寇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民游击战争，为了更残酷地压榨和欺骗东北人民，为了混淆国际视听，表示侵华反苏的决心，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开始实行保甲制、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批地掠夺民族工商业；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并施行武装移民。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向人民加紧压迫；同时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军，改组伪军（一九三四年初日寇达二十余万人，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达五十万人）。在军事行动上，以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计划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

“治安肃正”，巩固“满洲国新秩序”，但是情况的发展与日寇的意愿相反。由于民族的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人民觉悟的提高；新型抗日军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东北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经过短暂时期的挫折之后，又重新高涨起来了。

一九三四年初在依兰县土龙山区，为反对日寇收缴地照和枪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数万农民大暴动。在不到十天之内，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日寇饭塚大佐以下三千余人^①，暴动很快蔓延到松花江右岸的富锦、同江、宝清、勃利各县。在这同一时期，正是南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部队占据着广大农村地区，向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铁路沿线据点，不断地袭击，粉碎了敌人的历次出击和“大讨伐”，形成了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游击运动的高潮。在这一长时期内，东北地区党组织基本掌握并贯彻执行了中央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中央《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的《告全党同志书》。这些指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抗日联军的建立

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中共东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时期，在延

^① “三千余人”应是“三十余人”之讹。据载土龙山暴动打死日寇饭塚以下二十三人，还击毙伪军盖文义大队长以下五十余人，说“三千余人”。当系笔误。

边和绥宁以及吉海铁路各地区，曾组织起农民和工人的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它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反对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东北地主和军阀。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使用原始武器，活动不经常，而且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对于群众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满延边各县的反日游击队，吉海铁路——磐石、海龙县反日游击队，密山、饶河、汤原反日游击队等，迅速地建立起来。虽然受旧军队和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破坏、阻挠，但这些游击队有斗争历史渊源，直接从革命群众中产生，因此颠扑不破，在抗日的内部斗争中，在同日寇的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不象“巴彦游击队”那样，缺乏斗争经验，加上该部队领导干部又执行错误路线，脱离群众，结果使时机成熟、人数众多、枪马齐全、地域条件优良的部队，经不起风险，很快地瓦解无遗了。

一九三四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抗日新高潮及人民武装斗争的新发展，把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队伍，逐步着手进行统一军队建制，使人民武装游击运动日益加强起来。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醉心于侵略的日寇，借口南京蒋介石卖国政府履行“塘沽协定”不力，以军事重压加于平津和整个华北，引起全国愤慨。中共中央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主张全民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东北人民武装就在这前后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如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一九三一年末在伊通、磐石、海

龙建立了反日的赤色游击队。一九三二年春，磐石哈马河子中朝农民暴动以后，地下人民武装——自卫队，和义勇军这些队伍合并为南满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二周年，在磐石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有三个团和师直属队；一九三四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十七周年，扩建为二个师和军直属警卫团、少年营。并在通化地区、鸭绿江左岸、安奉铁路两侧，以统一战线形式，编建了十个游击支队，以联系辽宁民众自卫军和东北反日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一九三五年秋，增编为三个师，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一军。

抗日联军第一军最初的根据地在磐石的二、三区，即玻璃河子、石虎沟，桦甸县的票河、横道河子、色洛河、红石砬子，辉南县和金川县的大房身、二岔沟以及抚松、通化、临江、集安、长白各县的山区。基本的游击区扩大到吉奉铁路、安奉铁路和通化地区、鸭绿江东岸地区二十余县。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九一八”事变前以及以后不久，曾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在一些山区建立过“苏维埃”和赤色游击队。救国军王德林暴动起来以后，中共东满特委除派遣干部参加该军活动外，并指示各县游击队积极加强反日游击战争，并从汪清县里的赤色游击队里选派五十人左右的一支小部队，参加救国军的“别动队”。一九三二年各县赤色游击队及别动队都有相当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初，东满特委正式取消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改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会和人民代表会议，把各县的赤色游击队、反日游击大队，于一九三四年春建立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延吉大队编为第一团七个连。一九三四年末至一九三五年初，以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为基干，改造成功了救国军的一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一个警卫营，一个青年义勇军大队，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二军。一九三五年末，扩编为四个师和军直属警卫团、青年义勇军大队（教导队）。

抗联第二军最初的根据地是：延吉县的鹰湾沟、倒木沟，海兰江山区和哈尔巴尔山区，汪清县的大小汪清，绥芬河山区、八人沟、对头砬子、腰营沟、大黄崴子以及汪清和琿春之间的山区。后期的根据地是安图县、敦化县、桦甸县交界及抚顺、长白山区。基本游击区是中东铁路东线以南，图佳铁路、牡丹江市以南，京图铁路老爷岭以东到图们江。西部为抚松、濛江、长白、临江、集安等约二十个县。

抗日联军第三军。一九三五年初，满洲省委鉴于巴彦游击队和珠河工农反日义勇军与孙朝阳救国义勇军失败的教训，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坚决执行组织人民武装——“反日游击队”。这个部队初期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把从孙朝阳部队分离出来的李启东等同志的武装，和珠河地方武装合并组织起来。大力开展珠河、阿城、双城等地区游击战斗，队伍迅速壮大。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珠河县宣告正式建立“珠河反日游击大队”，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一九三四年六月因战斗不断胜利，队伍发展壮大，扩建为“哈东反日游击支队”。下分九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迫击炮队，一个教导队。同时以哈东游击支队为基础，联合其他各色队伍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建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同年八月一日，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三军。初编九师之众，后缩编为六个师。

抗联三军的根据地最初在珠河、延寿、五常以及方正县大小罗勒密一带。一九三六年以后，主要根据地移转到松花江左岸汤原、东兴、庆城以及北安、绥化以东山区。该军基本游击区最初为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右岸十余县，以后扩大移转于松花江左岸、绥化、佳木斯铁路沿线及黑龙江右岸之萝北、佛山、绥滨县等，共达三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四军。“九一八”事变，王德林暴动组织救国军以后，组织了许多次的重大战役，如攻占敦化、额穆，伏击天野部队，进攻宁安以及中东路磨刀石车站的寇军等等，救国军总部直属的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这个团始终在党的政策思想指导之下行动。王德林、孔宪荣逃亡后，这个团成为救国军新编的游击军的基干，在绥宁地区联合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新的抗日战斗，掀起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新高潮。但是，由于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党的组织领导意见不集中，没有坚决执行吉东党的军事指示，从宁西南部轻易地向中东路以北移动，结果遭到寇军多次阻击，部队受到一些损失。一九三三年冬，游击军司令部和补充团到达密山和林口以东地区，部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四年秋，中共密山县委领导的密山游击队合并编入游击军，增加了新的核心力量，建立为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并开展了密山、林口、勃利、依兰、方正以及东部宝清、虎林、饶河一带的游击活动。一九三五年冬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四军。初编为两个师。一九三七年扩编为三个师。

抗联第四军最初的根据地为方正县与依兰县的山林地区，大小罗勒密一带。一九三七年以后移转至富锦、宝清、桦川交界地区。游击区为牡丹江——佳木斯铁路两侧及北老爷岭东西地区，宝清、富锦、密山一带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五军。这个军是在救国军辽吉边区部队、绥宁地区部队以及吉东游击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宁安县委、吉东县委、吉东局、吉东特委、东满特委以统战方式在整个救国军中积极活动，在该军前方司令部和一些部队里建起党的组织。经过宣传部，在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动员革命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该军，有的当战士，有的做其他各种工作。当时的方针是：一方面直接促使救国军“左倾”革命化，坚持抗日；另一方面造成有利条件，以便东满延边各县游击队以及吉东地区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易于成长壮大。在三年多的过程中，这一方针基本实现了。但也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例如，一九三三年秋李光“别动队”受袭击，一九三四年夏末“工农义勇队”被奸细拉走，救国军总司令部上层统一战线不能不破裂。但是，从全局看，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是成功的。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都是有救国军的工作渊源。第五军的大多数部队还是由救国军部队彻底改造过来的。

一九三三年冬，党估计到救国军内部的分化，上层统一战线存在的破裂危机。在宁安东部（平日坡），以辽宁边区部队“工农义勇队”、“宁安游击队”为基础与救国军总司

令部相平行的建立起“吉东抗日同盟军”，并设军事委员会。党的同志完全掌握了领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同盟军军事委员会联合了宁安、敦化、额穆、舒兰、苇河、牡丹江等地的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大量的“反日山林队”，开展了不断的游击战斗，锻炼了人民革命武装。一九三四年秋，为接受失败的教训，把辽吉边区部队和“工农义勇队”失败后所有的干部都加强到宁安游击队，并把它扩编为“吉东游击大队”。一九三五年二月在宁安三道河子区域宣布建立抗日联军第五军。初编两个师，第一师三个团，第二师三个团。军直属一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抗联五军南面与抗联二军联络，北面与抗联其他军队呼应，在不断胜利地打击日伪军中充实壮大。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伪满驻牡丹江森林警察大队七百余人举行暴动，参加抗联五军，接着在林口地区也有伪军起义来投。于是扩编为第三师，军属教导团，警卫营。

该军最初的基本根据地在宁安、额穆、镜泊湖沿岸以及牡丹江西岸老爷岭和东岸老松岭山区。一九三五年夏移转至北部牡丹江西岸和刁翎地区。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延伸到勃利县东部，富锦、宝清南部，完达山脉两侧山区。基本游击区是：西南起敦化、额穆，沿牡丹江两岸，北达依兰，再从方正松花江右岸直达桦川、富锦、宝清，中间有图佳铁路、中东铁路、林虎铁路、穆棱铁路。一九三八年曾伸张到哈尔滨东南及中东铁路两侧和拉图铁路以东，共二十余县地区。五军一师于一九三六年曾跨过松花江，一度进出东兴、庆城、铁骊地区。

抗日联军第六军。“九一八”事变前，中共地下党汤原县委，就曾经在汤原的西北和西南农村中，组织过地下武装和徒手的农民义勇队。事变后根据省委的指示，组织反日会和人民武装——汤原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夏，省委巡视员到汤原后，县委即积极着手新的武装组织。是年十月十日组织起人数不多的一支武装——汤原游击队。但是因为领导干部缺乏经验和许多“反日山林队”抱着反共的态度，这支初生的队伍被山林队“荣好”缴械了。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秋收运动、募捐购械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开展了汤原、萝北、通河地区的游击活动，队伍获得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党的干部缺乏阶级警惕性，被容留的土匪“老来好”暗中在队伍中拉拢落后分子，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队内发生叛变。“老来好”等杀了党的干部把队伍拉走，致使汤原县委检讨两次建军失败的经验，后派出党团员七十多人做骨干，并以县委主要领导人为指挥员，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初，这个部队以汤原为基地跨越松花江两岸，扩大游击战争，不断获得胜利。队伍人数和夺自敌人手中的武器大大增加，同时得到第三军的支援，于一九三五年底在汤原建立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下属六个团。一九三六年队伍发展到八个团，一个青年教导队，遂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下属四个师，每师两个团。

抗联第六军在松花江左岸、黑龙江右岸、小兴安岭和其以西配合第三军行动；在松花江右岸配合联军其他部队行动。最初的根据地为汤原县西北和西南六个县区。在松花江

南岸为依兰、桦川的双鸭山和太平川一带。

抗日联军第七军。中共饶河县委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在该县朝鲜族农民中及少数汉族农民中，建立地下武装组织形式——“农民反日自卫队”，但不久即被当地旧东北军的“自卫军”和“救国军”所破坏。一九三二年秋组织了六十余人的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饶河反日游击队”。该队公开活动，对乌苏里江左岸饶河、虎林等地抗日活动有较好的影响。但一九三三年一月受到该地区救国自卫军陈东山、高玉山部队的压迫，饶河县委指示该队，在保持一致抗日和共产党组织独立的条件下，接受救国自卫军军事的统一指挥，因而被收编为一个“独立营”。但是，“饶河反日游击队”因战斗力强，组织纪律好，在群众中有深刻印象，事实上保持了军事上的独立游击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东山、高玉山军瓦解后，它成了乌苏里江岸唯一的一支中坚队伍，人数迅速增加。一九三五年一月吉东特委指示，将该部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第四团。不久该团扩展发展编成一个师（两个团一个营）。一九三六年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编制三个师（每师三个团）和一个独立团。最初的根据地为饶河县的小佳河、八响地、大菜子沟及同江县的大旗杆。游击活动北达同江、抚远，西到宝清、富锦，南至虎林、密山。

抗日联军第八军。一九三四年初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编成二万左右人的“民众军”。在一个月內对日寇展开了广泛的游击作战，寇军曾遭到惨重的打击和损失。但是，该军的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指挥为地主阶级分子所掌握。最初农民自发地、主动地到处打击日寇，扩大活动地区，以后地

主阶级领导分子，在军事上转为消极的防守行动；同时领导成员间在战斗紧迫的环境中，侵吞农民暴动“果实”，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暗中勾结日寇特务。党在“民众军”中，缺乏领导干部，只有个别党员参加该军做局部工作。这样，“民众军”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在日寇不断增强军事压迫和使用政治分化收买之下，趋于瓦解状态。一九三四年秋只剩下六、七百人，由谢文东^①率领东走，企图渡过乌苏里江逃往苏联。在饶河县委与饶河游击队积极支援之下，稳定了该军的士气，劝阻了该军领导人逃亡的意图。年末该部返回依兰、勃利、桦川，得到我反日联军第三军及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的协助，并得到联军各部队的支援，在方正、延寿及北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吉东和北满党加强对该军政治和军事领导，在军队中建立政治领导工作系统，该军人枪大增，逐渐恢复壮大，编为三个师。一九三六年底，正式宣布建立抗日联军第八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增编第四师。

抗日联军第九军。吉林自卫军李杜等部于一九三三年初崩溃后，在宝清地区留有一个团。团长李华堂^②坚持抗日。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间，在松花江下游左岸地区得到我抗

① 谢文东 一九三九年四月在牡丹江北刁翎为警卫营长姜××胁迫投降伪满洲国，后积极“反共”。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谢在依兰、牡丹江市之间为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首领，有千余武装。一九四六年春被我军消灭。

②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进攻方正县陈家亮子，李华堂负伤，送西凤沟里密营养伤，为日寇俘去后投降。一九四五年末，在依兰、方正间为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司令”。一九四六年被我军消灭。

联三军及五军的支持活动，党在该部队中加强领导，建立政治制度。一九三六年末，该部人数发展到四个团，编为两个师，并正式宣布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日联军第十军。一九三三年，在拉滨铁路沿线的冯占海、李海青^①、官长海等的吉林自卫军和其他救国义勇军等崩溃瓦解后，在该地区残留着上万的“反日山林队”。报山头“双龙”（汪雅臣）^②，就是该地区最大反日山林队之一，人数近二千。一九三四年珠河中心县委曾派党员干部去进行统战工作。政治影响虽好，但组织效果不多。最主要的是缺乏更多的干部人员派到那里去。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该部人数减到千人左右。一九三六年末，吉东党和军的领导继续派干部去联络帮助，稍稍获得发展。同年十一月宣布取消山头，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重新开展了拉滨地区的游击战斗。一九三八年配合第四、五军西征部队，活动到哈尔滨附近的阿城、榆树、双城等地。

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在土龙山农民暴动直接影响下，桦川县、双鸭山煤矿三百余名矿工，在祁致中同志^③倡导和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举行起义，组织“反日山林队”，推祁致中为首领，报山头“明山”。桦川、富锦、勃利的一

① 周保中同志此处记忆有误。李海青没有参加吉林自卫军，他独树一帜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和李杜等吉林自卫军没有联系。

② 汪雅臣非党人士，接受党的领导，坚持抗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在舒兰县冲河山区英勇战死。日贼对汪烈士深为衔恨，将其首级割去。东北光复后在哈尔滨重新安葬。

③ 祁致中同志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在黑龙江右岸萝北地区游击战斗中牺牲。

些农民踊跃参加，很快就达五百余人。一开始这一支队伍是拥护“民众军”的，其成分多数是工人、农民，领袖是矿工。因此政治思想没有受束缚，游击行动非常积极。活动范围，西达方正、延寿，东到富锦、宝清，南到密山。“民众军”崩溃时，这个队伍正在发展。一九三四年秋，中共密山县委、勃利区委都派了干部到该部中进行统战工作，开始接受党的政治影响。一九三五年冬季之后，经常配合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行动，并得到支持。吉东党的工作深入到下层战士，部队在游击战斗中，不断进行改造作风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人数扩大到千人左右。一九三六年春在勃利宣布取消“明山”山头，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同年夏队伍扩大。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富锦成立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编为四个团，一个独立营。

“九一八”事变初期，以东满延边为中心，在东北各地少数民族——朝鲜居民中组成“反日会”，不久，改组为“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团结着广大的朝鲜爱国志士，以联盟形式同中国人民团结合作，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联第二军同时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在“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民族革命群众活动的基础上，创建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他各军领导干部成员和战士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会员参加。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中朝人民为共同事业，把鲜血凝结在一起。除上述抗联十一个军以外，参加联军的队伍，还有救国军残余姚振山司令（救国军起义首领之一）所部编成游击军，约六百余人。其中包括孔夫人、闵宪仁营长，他们从来是同情共

产党的。在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副总司令孔宪荣及代理总司令吴义成先后向关里逃亡以后，他们团结在一起，立志不投降，不逃亡。在宁安以东，穆稜以南，东宁以西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接受吉东党的领导。一九三七年参加抗联第二路军。一九四一年春，孔夫人及姚、闵与日寇作战阵亡，所部大部战死。第二部分是迷信组织的“救国军”（山西五台山系）王荫武部队六百余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依兰、方正、延寿地区的农民组成的。一九三六年参加联军，接受党的政治军事的领导。一九三九年该部因作战人员锐减，十月间王荫武失踪，所部多战死，少数逃散和投降日寇。

在辽东和安奉铁路地区，有王凤阁的救国军千余人。一九三五年以后参加联军。一九三九年该部因战斗缩减，人数降至四百余人。一九四〇年完全战死。在辽宁旧东边道地区有反日山林队——“老双胜”（祁永全），一九三六年以后，正式参加抗联，人数多时曾达三千之众，一九三八年降至数百人，一九四〇年冬，“老双胜”部队除战死者外，瓦解星散。独“老双胜”一人坚持到最后，在桦甸、敦化交界的新开岭上的大森林中一棵青松下冻饿而死。

在辽吉边区的救国军残部李洪滨（万顺）旅长，于一九三八年（吴义成逃关里后）约千余人参加抗联接受统一指挥。一九四一年以后，李洪滨负重伤离队，所部除战死以外，所剩不多，自行瓦解星散。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成经过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三年，由赤色游击队到反日游击队；第

二，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初，由反日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第三，一九三五年初到一九三六年底，统一了军队建制，编为抗日联军十一个军。由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在党组织领导下，并得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的支持，受到广大群众和“抗日救国会”的拥护。各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关，亲密团结。部队有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和士兵的群众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这七个军是抗联的基本力量。第一、二、三、五各军战斗力最强，富有活动力，政治素养较高，内部团结巩固，纪律严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又属第一、二、五等军。抗联各军的武器装备绝大多数是夺自寇军手中的新式武器：三八式步枪、四四式马枪、轻机、阻击炮、步兵炮、重机、迫击炮等。抗联各军在军制上，基本实行“三三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不设营）有五个连到七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分三组，班有十至十二人。但有个别军只编两个师，或编四个师到五个师。三军在一九三六年曾一度编到九个师，但很不巩固，一九三七年底定为四个师。

一九三七年抗日游击战争最高潮的时期，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人数发展到五、六万人。此外在统一战线关怀下，固定地接受统一领导指挥的约五千人，不固定的约万人左右。人民喜悦联军的壮大，当时在辽、吉、黑各省民间广泛地歌唱着：

十大联军十万人，

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氛。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一九三五年秋，党中央指示撤销旧满洲省委，建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并将联军编为三个“路军”。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金川县河里地方，召开东、南满党和第一、二两军高干会议。决定：东南满合组为“东南满省委”。第一、二军编为第一路军。魏拯民同志担任东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同志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担任副总指挥。在通化地区、吉海铁路及安奉铁路的救国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很多参加了第一路军。游击地区西起辽沈，南达安东（今丹东市）及鸭绿江右岸，东到牡丹江至宁安以南。中间横贯图佳铁路，南段到京图铁路，东段到奉吉铁路北段约三十余县。

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依兰县的四道河子，吉东省委会上决定：以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编成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姚振山、王荫武部队参加二路军，此外还有一些反日山林队和救国军残余不固定地接受二路军领导。周保中同志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二路军的游击地区包括中东铁路的哈绥线两侧，拉滨铁路以东各县，沿牡丹江整个流域及方正县以东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约二十余县。

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初，北满党组织和三军党委在汤原汤旺河建立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抗联三、六两军及松花江左岸的抗联其他部队。因内部思想混乱，组织纠纷，迟迟没有执行中央指示，建立“路军”。延至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会才发通告，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以张寿篈（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许亨植同志任参谋长。当时政治委员未确定。第三路军下辖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游击活动区域沿松花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以东、黑龙江右岸，远至黑龙江平原，跨过中东铁路的哈满线到达嫩江下游三肇地区，共三十余县。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情绪更加振奋，“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了，许多游击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抗联的士气更加昂扬，如火如荼的游击战斗，燃遍了东北大部地区。尤其是在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下江地区的伪“三江省”。广大农村布满了抗联的“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寇军，使它遭到无休止的打击与损失；伪满军普遍动摇，成连、成营、成团的举行暴动投向抗联，有的消极，观望，不肯与抗联作战；有的被日寇暗中包围监视，不许他们和抗联接触。日寇认为这是必须“根除”的心腹大患，于是增加寇军关东军达五十余万之众，厉行法西斯恐怖统治，首先消灭抗联的基础，即支持抗联的人民。

七、斗争尖锐化

以旧军队抗日为主体的初期，因上层领导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没有持久抗战的决心，因而战略上是盲目的，作战方法是陈旧的与消极防守的。日寇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从部分寇军为基干，走狗伪满军为前驱，几乎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损失很少，收获很大。以至在旧军队崩溃以后，曾使人民群众抗日热潮受到打击，一时出现“谁做皇上给谁纳贡”的沮丧情绪。但是很快地代替旧军队而起的是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日同盟军、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这是新型武装——东北人民子弟兵，有高度的政治素养，有广泛的群众依靠。兵员的构成是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战士，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骨干。部队是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成立，在人民抗日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它具有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愿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思想基础。部队组织和军事生活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榜样的。满洲党组织和抗联领导干部，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必须在东北坚持进行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这一斗争是同全国全局相连系的。因此认识到在游击战略上是持久的，必须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巩固自己，为争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作战方法上，必须有高度机动性、灵活性，避强攻弱，避实乘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而自己则要尽可能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同时在游击作战过程中，利用东北农村人口分布

及自然条件的特点，在靠近山区的地带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并不断地扩大新的游击区，使游击部队获得更多的有利军事行动条件，人员物资补充有经常来源，作战后能获得休整训练场所。

日寇碰到的是这样新型的革命的人民武装，所采取的军事对策，也就不同于以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日寇开始在我根据地周围的基本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并初步实行消灭山边地区农民散户，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以图摧毁我游击部队与人民的联系。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深仇大恨，配合着游击部队行动，有组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敌人开展了争夺游击区域的斗争。南北满的游击地区不仅没收缩，反而扩大。在军事上，抗联部队更加机动灵活，主动的采取伏击、袭击和突然地进攻，使寇军兵力损失增大，军事设施不断遭到破坏。抗联部队从敌人手中夺取的精良武器装备不断增加，人员大量获得补充，部队不断扩大。游击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接之而来的就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游击战争高涨形势。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区卷入了游击战争的浪潮。但是，敌强我弱，敌人处于军事上、经济上绝对优势的地位依然持续，更因为日寇侵略我全国计划势在必行，因此对于巩固基地“满洲国”，以解除“心腹之患”的企图也就更加迫切，对我抗联的围剿就更加残酷。一九三六年开始，在南满和吉东地区，日寇厉行法西斯统治。

第一、加紧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保甲制、连坐法。把游击区的农民散户，一律迁移到便于日寇控制、监视

的铁路、公路沿线指定地点，构筑集团部落。在部落周围，挖深沟、筑高垒、设自卫团、派日寇特务直接控制。各部落之间，互相呼应联络，以防抗联之袭击，也便于监视群众的行动。在交通沿线及据点附近，禁种高秆农作物。农民的春种秋收，渔牧采伐，行商走贩，婚丧庆吊，亲友往来，甚至饮食起居，无一不在日寇特务监视之下。靠近游击区的城镇管制办法，也和集团部落相同。此外用抓丁、抓兵、抓“勤劳奉仕”的办法，控制青年于日寇掌握之中。凡集团部落以外的游击地区，一律焚烧。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散居着的农民田园庐舍化为灰烬，变为无人区。当时农民为日寇这种残酷的暴行编有两首小唱。

第一首：

“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
锦绣的东北日本来侵占，
小家底眼看就要完。
门牌钉的紧，
户口勤调查，
十家连坐安上警察，
保甲费全得一齐纳。
满洲狗官们，
丧心病狂了，
鬼子杀人他们当向导，
遍地狼烟大火烧。

见人就屠杀，
无故被活埋，
市镇乡村遍地成了灾，
强奸妇女谁能忍耐！
年景大荒乱，
人们过年，
吃穿不够还纳大租钱，
活倒霉捐税又增添。
坚壁又清野，
强迫归大屯，
扔下家业全部进阴城，
城关上下鬼把门。
实行挑兵制，
抓走青年人，
全家老少落进囚牢中，
眼睁睁无处逃生。
……

第二首：

说起归屯泪淋淋，
东北民众们，
痛恨日寇来归屯，
归屯最难忍。
先归吉林省，

后归奉天境，
归成大屯，
屠杀我们中国人！
吉林归了屯，
全家归日本，
日本人接上衙门，
出入看得紧。
出门得挂号，
回来报原因，
要有一时错误，
全家性命难保存。
同胞弟兄们，
万众一条心，
联合反日的人，
准备打日本。
收回东北地，
才有合家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才有中国人。

第二、厉行经济封锁，制定“经济犯条例”。抗联所需的粮食、服装、医药以及经费等等，凡来自民间募捐者或代为购办者，日寇一律加以禁绝。集团部落收秋时，经过特务清查地亩，做到颗粒归屯入仓，防止农民暗中留粮食给抗联游击部队。一切生活必需品施行“配给制”，特别是布匹、

棉花，各有限额，若多购一尺、半斤，即做违法论。凡以粮食物资供给抗联或代采购者，一律枪杀，甚至牵累亲人，连坐邻里。

第三、加强政治措施，严厉惩治“政治犯”。在城市，特别在农村，大力摧毁共产党和抗日救国会地下组织。经常进行定期的或临时的大检查，拘捕“共匪”或“抗日匪”以及嫌疑分子，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强迫供认。凡被认为是革命的骨干分子就被公开屠杀或暗害，嫌疑分子被集中强迫劳动。在城市强迫各阶层上层分子参加“协和会”、“协和青年团”、“国防妇人会”等等，培养一部分走狗来钳制大多数。在农村利用少数地主、富农分子，给予特权引诱，迫使他们成为统治农村、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支柱。以城乡的忠实走狗为骨干组成“宣抚班”、“工作班”，在宪兵和特务指挥下，跟随日寇“讨伐队”行动，专做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日部队工作，收买叛徒、逃兵等变节分子，以及派遣特务混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杀重要干部、策动叛降等等。从外部和内部动摇联军士气，瓦解联军。

第四、管制思想，推行奴化教育。凡是对日寇侵占、残酷压榨、侮辱、毁损等稍存异议，情绪表示稍有不满意者，或对反对抗联的各种措施执行不力者，一律视为“反满抗日”、“思想犯”，其罪与政治犯、经济犯等同。重者处死刑，或被秘密押往杀人工厂抽血致死；轻者关监坐牢，或流放远方。伴之而来的是奴化教育，伪造历史渊源，篡改地理沿革，使汉文变体，汉语成为“协和语”。风俗习惯强制效法日本，使长者“三缄其口”，青少年忘却祖宗。在社会上武

断宣扬“日满一体”，倡导“天皇至上”，说日本武士道的使命是要“黄种人自强”、“日满协和”、“满洲王道乐土”、“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满提携”等等。甚至欺骗世人，诡称日本是帮助满洲国走“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宣扬“日本皇军”的使命是反对“中国赤祸”，反对“苏联赤化”等等。

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日寇“中国通”从蒋介石反动派“剿共”那里学来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釜底抽薪”手法，加上日本法西斯自己的精心炮制，用来对付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毒辣手段，企图使抗日联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助，孤军作战。

日寇不仅使用法西斯统治手段，还不断增加关东军兵力。在军事行动上也大有改变，在重要的地区，集中重兵，把伪满军控制在后面，以便于监视和使用，而以日寇充当第一线；同时分地区包围封锁，依靠集团部落坚壁清野、稳扎稳打，长时期的对我军搜索进攻。在一地区内不断来回拉网，甚至采取“篦梳式”、“蹂躏式”步步前进，肃清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向其他区域进攻。

日寇虽然采取异乎寻常的法西斯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一切恶毒手段，来进攻抗联，但是他们的所谓“满洲国治安肃正”、侵华“后方基地巩固”这一目的仍然没有达到。全国抗战初期，抗日游击区域虽然开始不稳定，后方根据地屡屡受到破坏，但是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加紧打击与牵制敌人，南满我军迫近沈辽地区，扰乱安奉铁路沿线，进出鸭绿江岸；东满部队活动于吉辽边区，不断袭击京

图铁路沿线敌人据点、吉东及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右岸。各军展开积极活动，不断打击敌人，挫败敌人的围攻，致使伪满军成营成团的大批哗变、起义，投向我抗日联军。一九三八年间，吉东部队冲破敌人大包围，突入敌后，回到老游击区，开展靠近哈尔滨、吉林间的胜利活动。松花江北岸部队主力，越过小兴安岭，进入黑龙江平原，开辟了二十余县的新游击区。一九三九年攻克克山、北兴镇、讷河、德都。一九四〇年活动伸张到嫩江下游，突入三肇地区，攻占肇州、肇源，震动了长春、哈尔滨，引起了伪哈尔滨航空学校学生三百余人哗变出走。

这一尖锐斗争，自一九三七年持续到一九四〇年底，虽然使敌寇受到严重的挫折，侵华与反苏基地遭受巨大牵制与破坏，但我联军各级干部、战士也不断蒙受牺牲损失，广大民众受到空前的摧残、压制。由于联军同人民群众的隔绝，游击作战的困难越来越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以后，日寇为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增加到七十余万。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我联军虽在游击战争方面仍有新的发展，但东北游击战争处境已十分险恶，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急剧趋于低落，接着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日寇增兵满洲数达百万左右。这样大的兵力，在日寇进攻苏联处于待机期间，便把它使用来对付抗联，迫使我军陷入窘境，造成抗联后一时期的挫败。

八、坚持苦斗，东北光复

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整个形势，实际上已趋向于急转直下，处于不断遭受挫败的形势（黑龙江省游击部队暂时例外）。我联军游击部队，逐渐丧失机动灵活的战术活动，每每不得不在被迫情况下作战。战斗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即使是胜利的战斗，给敌人以惨重的打击，但我方损失仍极严重，得不偿失，人员减少，得不到补充。武器虽多，但大部分埋藏或毁坏。在这样情况下，根据地完全丧失，游击区受到破坏，问题严重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地步了。

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以“吉林省委”、“北满省委”集会讨论，估计到满洲新的情况，提出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方针，重新配置力量，制定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开始积极着手，将第一路军各军缩编为一、四、七三个支队。第二路军各军缩编为二、五、八三个支队。第三路军各军缩编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部队经过初步调整之后，人员虽然锐减，但政治情绪稳固，思想坚定，组织和纪律更加严明。在游击活动上以保存实力为主，采取高度的运动，远距离的“游走”，以避免敌人的围攻和追逐，特别是在敌人最容易活动的冰雪季节，避免与敌人接触。此外在条件有利，不易为敌人侦察发觉的林区，各部队派出相当人

员，散种农作物，自己准备必需的粮食贮藏。只有在明了敌情，情况十分有利的条件下（春夏之交及夏季易于隐蔽），才能迅速集中兵力，对敌人的孤立据点，或远距离脱离据点的敌人，给以意外的歼灭性打击。打了就走，使敌人不易跟踪反击。

对党和群众工作，首先对被敌人摧毁的老游击区的党团组织以及抗日救国会的组织，进行严格的整顿，完全采取地下深藏的方式，并且不得与游击部队发生联系。

一九四〇年的一年，抗联就这样紧张地机敏地进行了东北各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是仍然不能避免继续遭到严重的损失。黑龙江省平原游击活动在这时期曾有开展，但到一九四一年急剧趋于恶化，仗打的越多，敌人的损失虽然不少，但我方的困难有加无已，因死伤减员得不到新的补充，部队日趋缩小。

一九四一年初，中共东北各省委再度集会商讨，正确估计全国抗战所处的形势、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影响及发展的前途与东北抗日斗争的远景；同时克服了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所发生的取消主义，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革命旗帜，坚信最后胜利的远景，坚决贯彻保存实力保存干部的方针。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坚决实行合并东北三个省委为一个“东北党委会”，合并现有抗联各军为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部队。把这个部队的主力两千多人，完全控制于黑龙江下游深山密林与日寇完全隔离的地带，专门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教育训练，认定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新时期、新变化到来时新的斗争种子，非必要时绝不

滥用一人。另外分编了十五个小部队^①，每一小部队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分遣于北满地区者四，吉东和延边者八，吉辽边区者三。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2）准备局势新变化时期，大规模游击部队的临时依据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进行地下党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4）可能条件下在群众中组织地下武装。这些小部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经过挑选的中级干部。这些小部队的活动是和主力分离开的，由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直接领导。

一九四二年八月，主力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训练教育，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整整三年。部队干部和战士系统地学习了党的革命历史和重要文献。依据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对照东北实际斗争情况进行了“整风”。在干部教育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与战术著作。这一时期部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在政治思想修养方面，及革命文化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身体有了很好的恢复，特别在现代化军事战术、技术、技能方面有较好的锻炼和收获。从过去因战斗负伤和患病人员中，选拔出人员补充部队。这支部队在数量上同一九三七年高潮时期，是不可比拟的，但在质量上焕然一新，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强百倍。

^① 小部队不止十五个，周保中同志这里所指的是经他负责由抗联野营部队中派出活动的那部分小部队，其余部队未有涉及。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东北的游击运动，虽然消沉，但并不是象日寇所宣布的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一九四二年伪北安省区、伪吉林省区仍有我小部队突然出现袭击日寇据点，以及伪三江省区，密山、宝清、佳木斯间的交通运输被我小部队截击。驻兴河镇的伪军一个连起义投向我二路军二支队。一九四三年十月末，哈绥铁路线七河站南沟日寇据点被我小部队袭击，二十余日寇被歼灭。该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伏击追兵又消灭日寇百余人。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吉辽地区、伪通化省区，我小部队也有个别袭击活动。甚至在奉吉铁路线和拉滨铁路线，以抗联名义突然出现的自发游击斗争时有所闻。在日寇心脏区伪满新京及沈阳、阜新、抚顺、本溪等地，受我党地下活动影响，怠工、罢工，集中营里集体反抗、逃亡等等抗日的政治性事件仍不断发生。

燎原的烈火，虽然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期间，被日寇暂时遏阻，但是更大的燃烧正在新的酝酿着，最后焚毁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者，恢复东北锦绣江山，解放东北人民的信心和斗志是坚定不移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末，当我们从无线电收听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及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摘要时，东北党和抗联领导同志，就预想到未来的新任务。接着就是五月九日苏联攻克柏林，结束了反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战争。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欢欣鼓舞，认真研究了新形势，动员主力部队和分散活动的各小

部队全体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在一致行动计划下，加紧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全线攻入我国东北。中日矛盾交错复杂的纽结被苏联红军万钧重锤打开了。东北抗日联军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来自华北的八路军东进部队汇合，踊跃地协助苏蒙军作战，消灭了盘踞东北十四年之久的日寇百万关东军，捣毁了傀儡满洲国，解放了东北人民，使长白山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黑龙江扬起了响彻云天的巨浪。中共中央象“九一八”事变当时一样关心东北，为了保证光复后的东北领土和获得解放的东北人民，不重蹈历史覆辙，不被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出卖，在全国抗战胜利之后，领导东北人民高举民主旗帜，谱写了东北人民自卫斗争的新诗篇。